

Y I J I U W U Q I N I A N D E Z H O N G G U O

一九五七年的中国

○朱地著

华文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的
中國

○朱地著

華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064号

责任编辑: 杨宁

版面制作: 王萍

封面设计: 陈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九五七年的中国 / 朱地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3

ISBN 7-5075-1844-2

I. — … II. 朱… III. ①反右派斗争—史料—1957 ②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史料—1957 IV. D651.6 ② D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50507号

一九五七年的中国

朱地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305号8区5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net

电话: 010-63370164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晨旭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1.75 字数 279千字

2005年3月第1版 200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册

ISBN7-5075-1844-2/D·151

定价: 28.00元

引言 1957年事件的历史渊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1957年是极为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共和国的政治经历了一场由和风细雨到急风暴雨的大转折，从此中国政治背离了中共八大规定的路线，逐渐重新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这种翻云覆雨的变化，其中原因，至今仍然令一些人迷惑不解，于是，众说纷纭，产生了种种假设、推断或臆测。如前些年香港曾出版了一本题为《阳谋》的书，即认为：“从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到五七年一月，占据毛的头脑、使他不安的就是中国‘党内外’那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尽管事实上它并不存在。”“毛需要把那些‘蚂蚁’们请出来，然后聚而歼之。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它们请出来。他决定利用‘双百方针’。”^①于是，就有了共产党的开门整风。这本书的作者丁抒于1997年又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4月号上，题目是《不是阳谋是什么？》。这篇文章对我在《1957：大转弯之谜》一书中的两个观点提出了异议。其中的一个观点，就是关于毛泽东发动开门整风的动因。他认为，在国内，有关毛泽东发起反右运动的讨论，基本有两种观点，其中之一即：“认为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是为了保持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他想跳出黄炎培1945年提到执政党兴而复亡的‘周期率’。有

^① 丁抒：《阳谋》，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年4月修订本再版，第109页。

论者指出：‘甚至在他晚年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包含着这样的良好的愿望。希望通过这样的自下而上的‘大革命’，重新锻造党，使它从根本上摆脱周期率的支配。’可惜的是，‘一个正确的命题，最终却带来了一个不幸的结果。’”他所提到的“论者”，即是笔者。他认为我的这个观点不过是诠释了中共中央1981年发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有关结论。在这位作者看来，反右运动不过是毛泽东酝酿已久的一场“阳谋”。

丁抒的观点并不孤立。中国大陆出版的一本关于1957年事件的纪实文学作品也这样写道：“党号召大家讲话，号召鸣放，号召大鸣大放，号召——用15天之后的语言——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一场大‘阳谋’开始了”。^①似乎毛泽东发起开门整风的动因，就是为了将右派们“聚而歼之”。按照这种观点来分析1957年的事件，一切都显得很简单了：并不存在什么大转弯，整风就是为了反右。

但是，在世界上颇具影响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却持另一种观点。这本书写道：“毛泽东相信，思想灌输已经使得知识分子达到了足够的忠诚，所以党应当相信他们，让他们进行其目的在于改进党而不是反对党的批评。那些党外人士，特别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党派，应该请他们来批评党并提出不同的意见，以防止官僚主义的僵化、麻木不仁和脱离群众。”^②显然，按照这本书的观点，毛泽东在发动开门整风时，并没有任何“引蛇出洞”的念头，直接的和根本的动机就是对付党内的官僚主义。^③

^① 戴晴：《梁漱溟 王实味 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31页。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264页。

^③ 这一事件的一些亲历者也持有大致的看法。舒芜在自己的《口述自传》中回忆道：“毛泽东的那个讲话（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当时来说，

那么，毛泽东发动开门整风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可以说了解1957年大转弯真相的关键。

其实，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中，某些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常常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因而常常会出现人们意料不到的突然变化。1957年的开门整风就是如此。由于随后发生的反右派斗争不论在声势上还是在影响上都超过了它，因此，从形式上看，开门整风与反右派斗争有着一种因果关系。但是，只要我们从宏观上去观察，就不难发现，1957年的开门整风，首先不是作为原因而是作为结果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开门整风这一事件的发生，有着它自己的历史渊源，尽管它与反右派斗争有着难以切割的联系，但它们毕竟是在截然不同的动因下产生的两个意义不同的事件。那么，这次开门整风运动的源头又在哪里呢？

一位对中国现代史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曾这样写道：

在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教育等领域中，很多毛泽东主义的独特做法，早在延安时代实行的制度和实践中就有其萌芽形式。在政治领域中有减缓了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统治形式的发展的群众路线原则的实践；“精兵简政”运动；为适应地方的需要和条件并为广泛的群众参政提供条件而分散政治结构的主张；以

基本精神确实偏重于反‘左’的。所以，对于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思想上到现在也搞不清楚。现在有人提出来，认为当时毛泽东的讲话完完全全都是假的，反‘左’只是一个骗人的花招。可我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来看，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其实毛这个人呢，他基本上的精神是要‘整’，这是不错的。但如果说他最初就有想法，要‘引蛇出洞’（尽管他后来自己也说过‘引蛇出洞’这样的话），我看也未必。我倒是有这么个看法，觉得他原来也的确想搞一点开放自由，这也并不是假心假意。因为，他毕竟看到了斯大林的榜样。这个‘榜样’当时已经很明显，普通老百姓都看得清楚，那种搞法不行，他难道就糊涂到那种地步？所以，他也真心诚意地想稍稍开放一点，透透气。他自信得很，觉得自己能放能收，可后来的情况出乎预料，反着反着反到他那里来了，看看收不住了，因而就露出反右的面目来。你说他是‘阳谋’也可以，反正他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整’，但要说他从头至尾、特别是一开始就有这么个打算，我不太同意。”

及要求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下放”、“下乡”运动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缩小(即使它不能消除)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裂缝,它们反映了毛泽东长期敌视一切形式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同时,这些措施也是其后那场群众性的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前奏。^①

如果这位学者所说的“那场群众性的反官僚主义运动”指的是1957年开门整风的话,那么,他说得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毛泽东在1957年时的指导思想的基本点,早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就已经初步形成,而1957年的开门整风,不过是这些基本点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在中共党史中,陕甘宁边区时期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时期。从全国范围来讲,中共仍处于在野党的地位,但是在陕甘宁边区这一局部地区,中共却无可争辩地居于执政地位。在这种执政党地位与在野党地位相统一的特殊情况下,毛泽东不能不开始思索有关如何建设执政党的一些重要问题。其中最为毛泽东关注,并在他以后的生涯中始终探索不已的问题,是在执政条件下,共产党人如何才能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和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用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说法,就是“跳出这周期率”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局部执政的实践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这样一条思路:要使共产党人始终不敢松懈,就必须造成一种环境压力;而造成这种环境压力的基本途径就是发扬党内外民主作风,形成对执政党“内外夹攻”的局面。1945年,毛泽东将这一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民主新路”。1957年的开门整风,就是在全国执政条件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扩展这条“民主新路”而进行的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尝试活动。

^①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65页。

由此可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观点，要比较接近于历史事实。

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57年，为什么当毛泽东所期望的政治局面已经初步形成的时候，他却又发动了一场反右派斗争打破了这个局面？为什么一个正确的命题，最终却带来了一个不幸的结果？本书将从历史的源头谈起，以廓清这段历史之谜。

目 录

引 言 1957年事件的历史渊源 /1

第一章 历史“周期率” /1

- 一、中共诸君能跳出这周期率吗?/1
- 二、“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7
- 三、“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17

第二章 全国执政的考验 /29

- 一、“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29
- 二、“把党放在群众的切实帮助与监督之下”/42
 - 1.全国执政地位提出的新问题/42
 - 2.“内外夹攻”思想的实践与发展/46
- 三、“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53

第三章 知识分子问题 /62

- 一、“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62
- 二、为民主党派监督执政党创造政治条件/73

第四章 内部矛盾 /79

- 一、“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79
- 二、“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85

三、“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90

四、毛泽东发表“2·27”讲话/102

第五章 发动开门整风/113

一、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宣讲内部矛盾问题/113

1.毛泽东继续阐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13

2.刘少奇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几个重要观点/118

3.周恩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思路/120

4.邓小平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29

二、“早春确是已经过了时了”/132

1.一次别开生面的政协会议/132

2.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热潮/140

3.党内存在的消极抵触情绪/150

三、中共中央发布“4·27”指示/153

1.中央整风部署的变化/153

2.“4·27”指示的制定及其突出贡献/157

第六章 鸣放高潮/162

一、“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162

1.毛泽东号召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162

2.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督促各级党组织实行开门整风/166

3.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于“鸣”“放”问题的引导/170

二、“在我们这个社会造成自由批判的环境和习惯”/174

1.各种鸣放座谈会/175

2.报纸杂志的争鸣文章和采访报道/181

3.以整顿三风为主题的文学作品/185

三、“落霞与孤鹜齐飞”/192

- 1.对于党和政府关系方面的批评、意见和建议/193
- 2.关于党群关系方面的尖锐批评/195
- 3.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方面的批评和建议/202
- 4.对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的批评与建议/205
- 5.对于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左”的偏差的批评/208

第七章 几起风波 /211

- 一、“左叶事件”真相/211
- 二、北京大学：“五一九运动”/218
- 三、“匿名信事件”/222
- 四、“六六六会议”/229

第八章 急剧转弯 /235

- 一、改变整风主题：一个渐进的两难的抉择过程/235
 - 1.5月中旬，毛泽东开始关注事态的变化/235
 - 2.“五一九”运动后，毛泽东作出改变整风主题的决策/238
 - 3.各种鸣放形式成为“引蛇出洞”的手段/242
- 二、“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243
- 三、大转弯的几个促成因素/253
 - 1.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254
 - 2.为了维持正常的工作、学习秩序/256
 - 3.为了维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257

第九章 急风暴雨 /260

- 一、遭到反击的典型右派言论/260
- 二、“工人说话了”/271

三、“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274

四、“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280

第十章 重返“主题”？ /288

一、“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288

二、第二次“鸣放高潮”/293

三、以“双反”为纲/299

1.“反浪费”的提出/299

2.“反保守”的提出/302

3.“拔白旗、插红旗”活动/310

结束语 结论与启示 /316

一、1957年事件的历史结论/316

二、坎坷新路的历史启示/321

后 记 /334

第一章 历史“周期率”

一、中共诸君能跳出这周期率吗？

1945年7月1日至5日，受中共中央邀请，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了延安。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发表了《延安归来》一文，叙述了他访问延安的感受。其中一段写道：“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真所谓‘其兴也浚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的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①

^①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页。

这段话是一位老资格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饱经世事沧桑之后，向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袖明确而尖锐地提出的一个重大而发人深思的问题。黄炎培所提到的“其兴也浚焉”、“其亡也忽焉”，引自《左传·庄公十一年》，原句为：“禹汤罪己，其兴也浚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句话用了“禹之下车泣囚”、“汤之桑林自祷”等典故，说明由于夏禹和商汤勇于承担责任，他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呈现出勃勃生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夏桀和商纣将过错全推给自己的部下，并用严厉的刑法惩罚下属，导致众叛亲离，他们就很快地垮掉了。黄炎培将这两句话用在同一对象身上，则说明了这样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个阶级集团，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乃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跳出由兴旺走向衰败的周期。

确实如此。纵观中国历史，自封建集权制确立以来，还没有哪一个阶级集团或政党能够摆脱“周期率”的支配。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历史中的“周期率”现象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封建统治阶级集团的“周期率”现象。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①这种情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封建统治阶级集团的“周期率”现象，而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则是第一个封建集权制王朝——秦王朝的兴亡。“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真正是“其兴也浚焉”；但是，短短十四载，二世而亡，又恰恰是“其亡也忽焉”。唐代大诗人杜牧在著名的《阿房宫赋》中感叹道：“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页。

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段文字，正是中国历代王朝不断地重蹈“周期率”的生动写照。

当然，我们应当承认，封建统治也能够成就“盛世”。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史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西汉的“景武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雍乾盛世”等。但是，这些所谓的“盛世”，不过是夕阳的余晖，“其亡也忽焉”往往成为这种“盛世”的必然归宿。特别是清代的“康雍乾盛世”，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但是，从1662年康熙即位，到1796年乾隆去世，在此134年之间，世界正在发生一场巨大的变革，这就是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这场巨大的变革，使西方国家的生产力发生了质的变革，资本主义开始蓬勃发展起来。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挑战，同时也是一种机遇。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却完全不了解世界正在发生的这场历史性的变革，自我封闭，不思进取，沉湎在“老大帝国”的虚幻的辉煌之中难以自拔，甚至面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以“不贵奇巧”为名加以排斥，于是不可避免地迅速衰败了。1793年，乾隆在给英国王乔治三世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直到鸦片战争打了起来，清朝的道光皇帝还搞不清英国的地理方位和国家概况。

对于中国和英国之间的鸦片战争，马克思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这说明：落后就要挨打，而落后了还不自知，还用虚幻的迷梦麻醉自己，就更要挨打。而在同一时期，与中国一衣带水、被“老大帝国”的统治者视为“弹丸小国”的同样落后的日本，在19世纪下

半叶进行了“明治维新”，跟上了世界发展的潮流，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在甲午战争中，中国败在了“弹丸小国”日本手下，这一残酷的事实彻底打破了“老大帝国”的迷梦。

中国由强盛迅速跌入衰败的历史过程，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惨痛的教训。因此，中国的衰败，最深刻的必然因素并不在于鸦片战争，而是埋藏在那称为“盛世”的134年间。

封建统治阶级集团之所以一再地重演“周期率”现象，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这个阶级具有根深蒂固的腐朽性和寄生性。在一个朝代的初始，鉴于前代覆灭的教训，封建统治者往往能够采取一些较为廉明的政策和措施，以缓和阶级矛盾，巩固自己的政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产力就会比较快地向前发展，以至出现一时的“盛世”。但是，封建统治秩序一旦稳定下来，创业初始的环境压力也就不存在了，于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也就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这一王朝也就走上了衰败的道路。最后的结果，就是旧的王朝在农民大起义或封建阶级各集团之间的战争中灭亡。这一兴衰过程，可以说是历代封建王朝更迭的一般规律。当然也有例外，如北宋王朝，它不是出现在农民大起义之后，而是建立在旧的腐败的封建统治基础之上，一开始就承袭了长期封建腐朽统治积累下来的恶果，因此，北宋王朝一直没有出现过“盛世”。即使这种例外，也完全可以 from 另一角度证明历代封建王朝由兴盛走向衰亡的历史必然性。

第二，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周期率”现象。

给予历代封建王朝致命打击的农民大起义，同样摆脱不掉“周期率”的支配，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史记·陈涉世家》中记载：“陈涉少，尝与人佣耕，辍耕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勿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此后，陈胜发动农民大起义，果然实现了自己的“鸿鹄之志”，当上了“张楚

王”。但是，他只当了六个月的王，而且就在这六个月中，他就已经完成了—个蜕变的过程。司马迁写道：“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佣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见陈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至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伙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伙，故天下传之，伙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越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颡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陈胜的悲剧命运，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属于他所代表的整个阶级。农民阶级不是任何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它本身固有的弱点决定了它不可能独立地完成推翻封建制度的事业。因此，中国历史上数百次农民起义，都在重复着陈胜的悲剧命运，即使没有被镇压下去，起义的领导集团也会向着封建化的方向发展，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新的封建王朝的建立。于是，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历史现象：两种“周期率”交叉在一起，一个封建王朝的衰败时期，也就是一场农民大起义的兴起时期，而一个新的王朝的建立，往往是以一场大的农民起义的失败为前提的。

第三，中国近现代社会资产阶级政党的“周期率”现象。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先后出现过许多资产阶级的政党和团体，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同盟会和中国国民党。同盟会成立后，组织迅速扩大，许多充满革命朝气、具有政治头脑的新型知识分子加盟，并成为这一组织的骨干。看到这种情况，孙中山兴奋地说：“近日吾党在学界中已联络成就一极有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现舍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学问充实、志气坚锐、魄力雄厚之辈，文武才技俱有之。……有此等饱学人才，中国前途诚为有望